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有着永恒的价值。

遵义会议鲜明体现了党坚持自我革命的政治品质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以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斗争，把红军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废弃过去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屡遭严重损失，苦战一年，仍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根据地，实施战略转移。由于部队实行大搬家式的行动，11月27日至12月1日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的指挥任务已经转移到周恩来肩上，毛泽东关于改变行军方向的正确主张得到周恩来等的支持，先后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激烈争论，人们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2月8日，在扎西地域的院子街，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全面、系统反映了会上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的成果，集中反映了当时党和红军的智慧，站在全局的高度，对遭受严重损失后的革命如何坚持，如何恢复和发展，如何打开革命新局面，进行了总体设计。决议明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党勇敢的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领导革命战争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党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不仅开启了红军长征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胜利的新征程，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征



□ 王新生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程；通过这次自我革命，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党更强大了。

遵义会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20世纪20年代后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其中，王明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由于具有理论色彩，具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使人们不容易识别其错误和危害。加之王明等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也使得一部分本来不赞成或批评王明的人转而赞同并支持他。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遵义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一路线，“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会议还批判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式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由于经常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的休息，因而减员到空前的程度。”会议的结论是：“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战术原则，恢复了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

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符合中国红军作战规律的正确战略战术原则，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处

处主动。尽管在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仍多次改变战略进军方向，但都是从敌我情况、群众基础、地理条件等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避免了遭受惨重损失，甚至是全军覆灭的命运。由于思想方法对头，一步一步朝着保全自己的地方走，最终找到最佳落脚点，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完成了长征。

遵义会议是在紧张的战争形势下进行的，在短短的三天时间里，对多年来党的工作中所有重大问题的是非展开讨论，是不可能的。因而，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尽管如此，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了道路。

遵义会议开启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遵义会议以前，由于党的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还不高，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一些实际问题要靠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来解决。

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由于博古、李德推行逃跑主义，使红军几乎处于绝境。不解决当时最主要的军事指挥错误问题，党和红军有可能面临覆灭的命运。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通信联络中断了。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是通过上海中央局进行的。当时上海中央局有三部电台，一部可与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联系，一部与共产国际联系，还有一部是备用电台。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时，中共中央驻上海代表盛忠亮于1934年10月5日被捕叛变，之后不久上海中央局的有关报务工作人员也相继被捕叛变，三部电台都遭到破坏。这样，自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就完全中断了联系。

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紧迫的形势逼着中国共产党去独立自主解决当时面临的实际问题。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独立自主解

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条件。

其一，7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有实践经验、有威望的领导干部成长起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工作过，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受挫后，率领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树立起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毛泽东创建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建设党与红军的经验，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对其他革命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1928年10月，中共鄂东特委曾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习仲勋在谈到西北革命斗争时曾说，在与敌人斗争中，在与地方党内机会主义斗争中，“在毛泽东和朱德在南方发展革命武装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号召下，使我们在摸索中，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锻炼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可见，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周恩来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军委书记，是党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主要领导者。1933年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上既有丰富组织、军事工作经验，又深孚众望的领导人。

朱德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先后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被称为“红军之父”。

其二，在党内一些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其危害性，开始从实际出发看待中国革命问题，并成为有威望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张闻天是1931年9月下旬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左”倾错误对革命的危害性。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行军，谈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同毛泽东的意见逐渐一致。他的转变对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有重要作用。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

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王稼祥曾执行过“左”倾错误方针，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开始认识到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多次同李德发生争论。长征开始后红军处境日新危急，王稼祥更加认为李德的错误指挥是把红军引向绝路。

其三，在各根据地也涌现出一批有实践经验、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根据地有陈毅、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李富春、邓小平、毛泽民等，在赣东北有方志敏等，湘鄂西有贺龙、周逸群等，鄂豫皖有徐向前、邝继勋、曾中生等，湘赣有任弼时等，陕甘边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闽北有黄道等。

其四，广大红军干部、战士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长征开始后遭到严重损失的残酷事实中，逐渐认识到这是“左”倾军事指挥造成的结果。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彭德怀甚至在广昌战役后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但都没有被接受。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军事指挥错误、改变领导的意见。许多人认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党和红军的前途极其危险。

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不仅顺利解决了当时面临的紧迫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开展更好，表明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

自遵义会议开始，独立自主便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原则。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坚持斗争精神、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

坚持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优良传

统，遵义会议之前，党在共产国际、联共（布）指导和帮助下同错误倾向作斗争时，在方式方法上往往存在过火或欠妥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更是过分，他们不仅“无情打击”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李立三等人 and 被他们认为是犯“调和主义”错误的同志，而且也打击曾经反对过“立三路线”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重要干部。“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中开始贯彻后，他们对怀疑、不满或者不支持的同志，动辄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污蔑和伤害，给党造成重大损失。

在遵义会议上，大家对博古等人犯的错误尤其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还是当作同志对待的，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帮助的方法。因为，博古等在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根本纲领是一致的。李德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革命，其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在到中央苏区之前，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军事顾问组成员，也为各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做了一定工作。尽管他们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但仍然是革命队伍中的成员。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时，以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的确切事实，证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与会大多数同志赞同他们的意见。

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曾说：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尽管如此，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博古仍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鸡鸣三省”会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后，博古仍然是中央常委，并担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重要职务。李德在遵义会议后虽然被解除了指挥权，但有时让他参加一些军事会议，并征求他的意见。至于凯丰，没有因他对“毛张王”有不同意见而解除职务。

毛泽东后来同外宾谈到遵义会议时指出：“我们采取的方针，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采取帮助的态度，所以我们团结了党的绝大多数。”

遵义会议对“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帮助的方式，巩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博古等人也积极工作，在后来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遵义会议采取的党内斗争方式，为以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典范。

1988年，杨善洲正式退休。当时，组织安排他到省城昆明定居，但他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3月1日，大亮山林场指挥部、大亮山林场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杨善洲兼任指挥长。3月8日，经过筹划，杨善洲带着施甸县林业局抽调的17位同志，雇上骡马，驮着帐篷、工具、粮食、锅碗瓢盆，登上了“半年风雨半年霜”的大亮山，拉开了植树造林的序幕。

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处，过去因乱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当地农民饮水大多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经过杨善洲和干部职工及当地群众的共同努力，大亮山的森林覆盖率和活立木蓄积量大幅提高。2009年4月，杨善洲将价值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谢绝了当地政府的奖励。他在临终前还不忘叮嘱林场负责人：“一定要把林场的收益按比例分给群众，不能让群众吃亏。”

“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在杨善洲的改革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真正做到了“我们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园”。这是杨善洲坚守一辈子的理由，也是他奋斗一辈子的写照，更是他留给党员干部的宝贵精神财富。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杨善洲：

□ 张君梅

杨善洲（1927—2010年），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姚关镇陡坡村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保山地委书记。在任时，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实施小集镇建设，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退休后，他不愿坐享清福，到荒山秃岭植树造林，使几万亩荒山坡上了绿装，受到群众的爱戴、好评。杨善洲是具有全国影响的重大先进典型，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生动诠释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忠诚、干净、担当，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杨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欢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常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保山坝建成“滇西粮仓”

1962年，施甸建县，杨善洲从保山县副县长任上，调任施甸县首任县委书记。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群众口粮非常紧张。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摆在了县委班子面前。他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苦苦思谋群众吃饱饭的路子。县委从现实条件出发，从“推广良种、推行良法，坡改梯、改土增肥”着手，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努力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杨善洲更是走到群众中，带着群众抓生产，与群众一起制作小麦包衣种，跟群众一起检验“台北8号”新品种的产

量，在姚关公社进行改土换土试点，带领大家开展坡改梯。

1977年3月，杨善洲任保山地委书记。为了抓好粮食生产，推广机械化耕作与管理，保山地委作出了坡改梯，改条田，改水稻为粳稻，种绿肥红苕改良土壤，推行条播条栽等决定，有效地推动了农业的发展。杨善洲的车上经常放着锄头，下乡见到不规范的栽插现象，就要亲自下田、下地去手把手示范。1978年，“京国92”杂交水稻在板桥样板点试验成功，杨善洲马上组织五县区的领导和群众到板桥参观学习，“京国92”在全区顺利推广，保山坝、施甸坝的水稻单产历史性地跨越了千斤大关。1978年至1981年，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在第一，1980年引起了农业部的重视，全国农业现场会在保山召开，保山从此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

不光要解决吃饭问题,还要解决用钱问题

1981年，国家农委下发《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指出：积极鼓励和支持社员个人或合伙经营服务业、手工业、养殖业、运销业等。于是，保山地委每年都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如何总结经验，充分发挥山区优势，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加速发展商品经济。

杨善洲认为，种一次茶叶，可收入几十年，是解决老百姓致富的长久

之计。他在施甸县任县委书记时，积累了种植茶叶的丰富经验。所以，地委决定大力发展茶叶。他将施甸老麦样板与昌宁保丰茶园的经验相结合，把新茶园开垦与老茶园改造相结合，推广梯地、深槽、多肥、密植、加强管理等先进技术，执行超交减税政策、超交奖励政策、利润返还政策鼓励发展茶叶生产。1981年至1987年，施甸的大尖山、昌宁的尼诺、隆阳的西湖、龙陵的小黑山等万亩茶园建成，全区共发展茶叶50多万亩，涌现出了大量的种茶典型，全区每人种茶收入在100元以上的生产队就有2593个，占25%，许多农民走上了致富路。

一直以来，保山种植的甘蔗主要品种是罗汉甘蔗，产量低、成熟晚。为了改良品种，杨善洲带领科技人员多次到外地考察。不久新品种就得以引进，昌宁县的湾甸样板、保山县的潞江坝样板成功以后，杨善洲召开全区蔗糖工作会，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坚决抓实抓好发展蔗糖。由于广大党员干部思想统一，加上地委措施得力，保山的甘蔗种植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保山地区五个县相继发展甘蔗60余万亩，建成了怒江、东风、旧城、湾甸等糖厂，蔗糖成了保山的支柱产业。

保山的芒宽公社地处怒江河谷，气候炎热、土地肥沃，利于咖啡生长。杨善洲任地委书记后，听说芒宽有个农民朱自祥，因为在自留地种了咖啡，盖起了一间瓦屋面楼房被批斗的事。1980年他亲自到芒宽找到朱自祥，鼓励他带领农民在自留地大力发

展咖啡。80年代初，芒宽的小粒咖啡由原来的几十亩发展到近千亩，区域从坝区田地延伸到山坡荒地。1980年，全国咖啡生产现场会在保山召开，芒宽成为了全国的典型。直到今天，咖啡仍然给当地群众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

1981年1月，杨善洲就农村小集镇如何组织好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型行业等问题召开会议，要求全区每个公社必须以公社为中心，建设一个小集镇，发挥公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作用和对农村商品集散和流通的功能，繁荣搞活市场。随后，一场孕育于板桥青龙街的小集镇建设在全国率先展开，电器修理店、裁缝铺、铁匠铺、面条店、糕点铺、小饭馆等上百家店铺在板桥街开张营业，带动了全区经济的蓬勃发展。

留得青山在人间

针对森林管护和造林存在的问题，1987年，在杨善洲的带领下，地委办在施甸县开展了一次专题调查，实地查看3个林区 and 一万多亩人工造林的长势，分别同5个区、10多个乡的干部、林业工作者和部分农民进行商讨，交换意见，形成了关于继续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只有采取适合群众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多种营林造林形式和对应措施，才能发挥山区的优势，使荒山变林地，使山区群众逐步走上造林养山、靠山致富的道路。